



内部资料

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0年·春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研究院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0年3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公众微信号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 934 办公室

邮 编：100089

联系人：金玉洁

联系方式：010-8881 8121

传真：010-8881 0062

收稿邮箱：g20@bfsu.edu.cn

jinyu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目录

致敬杰克·韦尔奇

一个 HR 教育工作者对韦尔奇的纪念.....	1
-------------------------	---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第一章 完善新冠疫情国际合作机制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变革.....	10
第二章 抗击新冠疫情与中日韩三国合作.....	14
第三章 让疫情成为中日韩三国关系全面修复的新契机.....	18
第四章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完善金融治理体系.....	21
第五章 疫情恢复期如何发挥市场的力量.....	25
第六章 构建微观体育运动的激励机制 加快宏观体育产业的发展步伐..	28
第七章 新冠病毒疫情下对国际资本市场法律风险与责任的思考.....	31
第八章 COVID-19 to stimulate epidemic disease economy.....	43
第九章 Supply Chain Fluctuation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46

一个 HR 教育工作者对韦尔奇的纪念

朋 震¹

杰克·韦尔奇先生去世一个星期有余，一开始想过总结提炼他的管理“金句”、经典语录来重温他伟大的管理思想，但总有人比我更勤于做文献整理和挖掘，各种成果早已见诸头条；想过谈一谈韦尔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的影响，但这方面话题讨论显然企业家们比我更有资格，他们商场厮杀经年，感同身受、耳濡目染；还想过就通用电气近几年的式微对韦尔奇的功过进行一下评判，诸如“多元化公司时代已落幕”、“通用掘墓人”、“忘掉过时的韦尔奇圣经”之类的标题文章，以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有多么的“新”和多么不同，同时表明我们管理学者“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但在一位“世纪经理人”离开之时，匆忙对其过去言行进行“审判”下结论，要求他对二十年前的雇主乃至他成千上万的管理信徒的迷之未来负责，多少显得有点不厚道，“人走茶凉”不是我辈风格。

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职业，我甚至未必知道这位“世界第一 CEO”是谁。韦尔奇 1960 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UIUC），化学博士毕业，我大学本科就读于人民大学商品学系（食品、纺织品化学为其主要专业方向），工作后 2010 年在 UIUC 这所以“玉米地”和工科院系而闻名（同样不逊色的是其劳动关系学院和商学院）的学校访学一年，同样的化学背景出身、出五服的“准校友”关系、书柜里躺着的韦尔奇的三本代表作——《自传》、《赢》和《商业的本质》、电视里聆听的几次现场对话，算是我和这位大师仅有的一些“物理联系”了。显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专门撰文去纪念他的原因。

思来想去，纪念韦尔奇的真正原生动力来自于他的管理思想对我人力资源管理教育观形成的影响。2001 年韦尔奇在鲜花与掌声中卸任，通用电气的市值从 130 亿美元狂奔至 5750 亿，他个人获得了创纪录的 4.17 亿美元退休金，01 年出版发行《自传》，也开启了其管理思想在中国大陆传播的黄金期。彼时，我尚在求学，正经历由理工男向商科男转型的思维阵痛期，很容易被他的成功经历和经验式而又带有些许实

¹ 朋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组织文化、组织绩效

致敬杰克·韦尔奇

证色彩的管理哲学所吸引，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对管理者的重要性（“在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人力资源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的企业”）、文化之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建立哲学观”、“坦诚的绩效文化”）……这些来自实践的鲜活观点点亮了书本里和课堂上乏味的知识，让我深信人力资源的价值，也坚定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习路径。

从教之后，教授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寻找有思想深度又有实践说服力的国际化企业标杆案例是工作需要，回忆起研究生期间导师们不同角度的相关精彩介绍，自然而然，与授课对象互动最多的话题是韦尔奇的“活力曲线”、“C会议”、“接班人选拔”等。

从专业求学到专业教学将近 20 年持续不断对韦尔奇管理思想的学习和讨论，很多东西渗透进了我的管理教育观念，同我个人的知识经验深度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纪念杰克·韦尔奇就是纪念我十五年的从教和二十年的管理咨询生涯，纪念杰克·韦尔奇就是总结他的管理思想对我三个人力资源管理教育观形成的影响。

HR 教育观一：人力资源管理是关乎“赢”的能力

无论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玩的牌戏、还是学校中的冰球、橄榄球、棒球等强调身体对抗的运动项目，都在塑造着韦尔奇强烈的竞争意识。他描述家乡是“一个斗志旺盛、竞争激烈的地方”、“一个让男孩子们茁壮成长的好地方”。体育和家庭教育给了韦尔奇“赢”的基因，让他意识到“在商业生活里，取得赢的结果是伟大的”。

在他总结他赢的生涯时他说：“谈到赢的时候，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他没有先谈战略、财务预算、业务创新、兼并收购和著名的“六西格玛”这些与“赢”利直接相关的因素，他说这些更多“涉及到组织外的世界”，在优先序上他排在前面的是“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机制”。这是典型的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应对外部竞争的真正优势来自于组织内部：赢的基础在于“强烈的使命感和切实的价值观、保证坦诚的态度与文化、发挥绩效考评的力量、让每个人得到发言权和尊严”，赢的组织内部力量包括“领导力、招聘、员工管理、解聘、变革与危机管理”。几乎所有这些都是人力资源问题，这让韦尔奇坚定地“把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提升到组织管

致敬杰克·韦尔奇

理的首位”，并且认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既是牧师，又是父母”（这是我见过的最崇高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胜任力模型）。

把韦尔奇的思想投射到 HR 的要求上，不管是经理人还是 HR 专业人员，都要回答这个灵魂之问——我们是否能帮助公司去“赢”，我们做的事情是否真正帮助公司去获胜？如果董事会、CEO 期待人力资源帮助组织内部发力来赢得外部竞争，那么 HR 教育工作者应该帮助从业者去逆向思考，从理解“赢”的要素出发、从理解外部竞争出发、从理解业务发展需求出发去制定人力资源政策，这时候我们过去所关注的所谓的“员工公平感”、“员工满意度”、“成本控制”、“员工流失率”等都不是关键，这些“浅表层指标”很容易迷惑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应始终坚持把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是否有助于公司获得外部竞争优势作为恒定的决策标准，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思维方式，跳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窠臼思考对组织目标的贡献。

由此，我们便容易理解为什么韦尔奇如此钟情于遵循“20-70-10”严格分布的活力曲线了：它并非是追求绝对公平和保护员工满意度的产物，它更非完美，但这是一项能帮助公司去“赢”的考评政策，能“让胜利者脱颖而出”的机制。今天我们一些企业的 HR 熟练应用各种经典工具，如设计完美的薪等表、全面覆盖的 KPI 体系、眼花缭乱的考核工具、令人辞穷的胜任力辞典、立体化的职业发展通道、刺激性的股权激励制度……还有一些企业面向新生代员工推行“全面激励”创新，各种激励政策组合玩法层出不穷，OKR、游戏化、积分制等等层出不穷，但这些政策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公司去“赢”呢？是否帮我们获取更多“赢”的要素呢？是否真的有助于提升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呢？HR 有必要厘清这些问题而后动。

德鲁克说“企业就是创造顾客”，不断创造顾客价值就是“赢”，从德鲁克和韦尔奇的思想延展开来，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创造绩效”而不是“创造技术工具”，HR 不必通过创造和使用各种技术工具来证明自身的专业价值，而是要在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中植入“赢”的基因，持续提升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这才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赢”的价值。任何不能创造绩效的人力资源政策都是成本（哪怕一分钱没花也有机会成本），和“赢”无关，这是我坚持的第一条人力资源教育观。

HR 教育观二：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资源配置决策科学

致敬杰克·韦尔奇

人力资源管理关乎企业能否“赢”，其战略性体现在人力资源决策是否能引导资源（人、财、物和时间）流动到真正能够产生高绩效的人和相关领域上。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得益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看不见的手引导资源流向产出更高的领域，而韦尔奇则是用“数一数二”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评价和筛选 GE 的“优势业务”，终结“四处撒钱的恶行”，不断优化非相关多元化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尽管遭到“短视”的诟病）。

在韦尔奇看来，如果说“数一数二”战略是“硬件”（业务）的区分手段，那么“活力曲线”就是“软件”（员工）的区分手段，前者是为了将企业资源配置到优势业务上去，后者是为了将企业资源分配到高绩效员工群体。“所谓区别考评制度不过是资源配置而已，这正是企业领导者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得到自己报酬的首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通用电气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也意识到“公司只有这么多资金和精力”，想要赢，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首先做好资源分配的决策，而区分则是资源分配决策的前提。

很多人将“20-70-10”等同于末位淘汰，我认为这是误解，其本质是一种动态优化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区分将组织的核心激励资源（奖金、期权、表扬、培训、发展机会等）持续分配到回报率更高的员工群体，以不断提升组织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思维，而淘汰掉最后的 10%在韦尔奇看来就像砍掉亏损的业务一样，是激励资源配置的再优化。在资源配置方面，韦尔奇显示出其化工博士的理性思维逻辑：“区别考评就像坦诚精神一样，使商业生活变得更清晰。”

对于无法接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地区和企业来说（如我们的国企），我们无需刚性地模仿末尾淘汰，但是至少要基于有效区分来建立类似的资源分配的动态优化机制（诸如华为、阿里的考评实践），一切是为了“赢”。

此外，作为管理者或者 HR 专业人员，几乎所有重要的人力资源决策都和资源配置有关，例如：

- 一、组织设计与开发决策：关于不同业务或者不同职能人力资源投入的决策；
- 二、人才管理决策：是为明天投资的一系列资源分配决策，战略性人才、关键人才的区分是为了明确企业一段时间内的开发资源应该聚焦哪些潜质人才；

致敬杰克·韦尔奇

三、目标管理与评价决策：确保当期任务完成效率的组织资源配置决策，引导员工投入的个体决策与组织资源配置要求的方向一致性；

四、招聘与培训决策：决定围绕哪些业务短板和能力瓶颈来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同时决定人力资源补充的质量标准；

五、招聘甄选与培训开发的组合决策（Buy or Build）：与公司人才供应链的资源配置决策相关，即在供应链上资金前置还是后置的问题；

六、薪酬与福利决策：一系列激励资源分配的决策（分给谁、怎么分、分多少等等）

七、……

当我们认可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决策科学时，它必须遵循决策科学的基本原则：

1、管理系统整合：人力资源决策目标往往来自于非人力资源领域，人力资源决策必须和核心业务流程、核心管理流程（如战略、市场、供应链、财务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确保管理决策系统的内部一致性；

2、区分边际价值：平均价值往往对决策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关注边际价值最大的点，无论是对关键人才的区分、对卓越绩效的区分还是对人力资源政策有效性的区分将有助于决策者寻找一个小改变带来大变化的支点，设定资源分配的优先级；

3、追求整体最优化而不是局部最大化：成熟的决策通过取舍予以平衡，追求组织整体结果的最优化而非局部的多多益善（不追求最高的员工满意度也不追求最低的员工流失率）；

4、共享心智模式：组织内部关键影响决策者和决策重要影响者应对决策原则、决策标准和决策框架形成一致观点，HR 通过共享决策模式将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一体化。

1983 年，GE 再造克罗顿维尔领导力开发中心，彼时公司正大规模收缩业务，下级向韦尔奇汇报并申请预算时，韦尔奇的回复是“无限”，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应该在一所破旧的中心里学习”，这样“这项投资的回报将永远继续下去”。花费 7500 万美元升级管理发展中心、总部健身中心和会议中心这些“非生产性”事情，但却大规模关闭工厂、辞退员工，这就是韦尔奇当年的资源配置决策，同样，HR 教育工作者任务之一就是要推动 HR 专业人士和经理人养成坚定而理性的投资观，教会他们在复

致敬杰克·韦尔奇

杂的情境下如何清晰地预判重要人力资源决策的资源配置导向，因为资源配置决策差异将带来组织绩效的差异，这是我坚持的第二条人力资源教育观。

HR 教育观三：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定义管理哲学

谈到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很容易联想起搬运生铁块实验、时间动作研究、差别计件工资制、职能工长制和工长手里的秒表，联想起那些科学管理方法与工具，但 1912 年泰勒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演讲时否认到：“科学管理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而是涉及到所有工人和管理层的“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这场心理革命的实质就是要求双方从“如何分配剩余”的争执走向“如何增加剩余”的合作。科学管理开启了一个时代，其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一系列的技术方法创新，而在于其背后的两个管理哲学：用科学方法取代个体经验方法，处理企业事务，提升效率；管理层和工人的合作替代斗争和冲突。背离了科学管理哲学，所谓的科学管理方法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难怪我们一些制造业企业在推行劳动定额管理的时候总是难获工人支持、眼见的产能潜力就是挖掘不出来，既没有为工人赋能帮他们提高效率、降低劳动强度的科学方法，也没有与工人合作、彼此信任的心态和文化。

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的有效性是由管理哲学来定义的。相对技术方法而言，显然管理哲学更隐性、更难以传递和表达，但是成功的管理者、HR 却善于在隐性的管理哲学和显性的管理技术方法之间穿梭自如。1981 年韦尔奇得到了 GE CEO 的职位，他在自传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上任伊始在公司内部开展的一系列的重要管理变革，包括大规模削减组织层级、基于“数一数二”标准整顿出售或者关闭业务、辞退约 11.8 万员工、基于活力曲线和九宫格的人员评价、再造克罗顿维尔中心、改革期权计划、成立唯一经批准可以扩大人员编制的“公司行动集团”等等，这些铁腕变革造就了韦尔奇“中子弹杰克”的称号，但他却将这部分的内容冠以标题为“建立哲学观”，他将这些方法和手段都归结于他希望作为 CEO 给通用电气管理哲学打上的烙印。

“经营体系运作的关键是要理解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督促的过程，这个体系要不断地产生和重复强调那些好的理念”。“那些好的理念”就是韦尔奇所认定并坚持的一系列管理哲学：坦诚面对现实、富有远见、人的企业、无边界……不理解韦尔奇的

致敬杰克·韦尔奇

管理哲学，就难以理解他的很多极端措施，不去定义韦尔奇的管理哲学，就会在学习还是批判韦尔奇管理方法的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仅举两例说明。

GE 于 1982 年加大了期权奖励的幅度和频率，1989 年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500 名经理人和 3000 名优秀员工，在这之前是把所在单个企业的年度分红而不是公司整体收益分享作为最大的奖励，因为在韦尔奇看来“整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股票价格比他们各自企业的经营成果更为重要”。这在我们今天很多集团化企业看来可能很难认同，严格的责权利区分是我们更容易接受的分配哲学，我们甚至可以用“搭便车”、“大锅饭”、“平均主义”来指责这种“倒行逆施”。韦尔奇对这种改革的解释源自其背后的管理哲学：无边界。“当整个公司的经营业绩的获益远远超过了他们从各自企业中得到的任何收入时，再次强化了公司 500 名高层管理人员的分享理念。”韦尔奇希望通过薪酬制度改革去推进“群策群力”、推倒内外部围墙、分享好主意、好经验，薪酬体系改革成为无边界分享式管理的助推器。毫无疑问，这种制度设计存在巨大漏洞甚至不公，但在韦尔奇看来“公司的股票期权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直至在管理者价值评价体系里加入无边界行为标准，都真正强化了无边界意识。我们再次回到主题：判断一项人力资源政策正确与否不在于这项政策本身是否完美，而在于这项政策是否定义了关乎“赢”的管理哲学。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饱受争议的“活力曲线”与强制分布。大家除了质疑这种管理措施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如公司政治腐蚀、过分刻薄专横、对弱小者的不公、削弱团队精神、让中间人失去动力、让管理者难堪、压抑创造力等等），还怀疑韦尔奇口是心非。因为韦尔奇一直倡导“人的企业”的管理哲学，重视团队力量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在韦尔奇看来正是因为 GE“发现和造就了了不起的人”才“造就了了不起的产品和服务”。但是请注意，在杰克韦尔奇的管理哲学里，企业是“人的企业”，但不是“某个人的企业”，“关注企业的每一个人”，对个人的严格区分才使整个企业员工群体更优秀。所以强制分布不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的背离，而是它的延伸和政策外化——正是因为将人才看成企业发展之本，才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去优化人才质量。

致敬杰克·韦尔奇

很多人还会说，为什么有些企业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却收效甚微甚至破坏力极强。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活力”曲线的管理哲学土壤里的另一关键要素——坦诚。在韦尔奇的三本代表作中都专门强调“坦诚”的价值观，坦诚也是贯穿韦尔奇各类管理哲学的主线。他认为“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缺乏坦诚并不是恶意欺诈，而是不能开诚布公，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活力曲线发挥作用之前，韦尔奇花了十年时间布道以“坦诚”为内核的管理哲学，普及坦诚精神，在 GE 建立起一种坦诚和信任的绩效文化。所以他后来建议，在员工接受坦诚的管理哲学之前不可以、也不必过快地推行这种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正直的、能够给员工提供坦诚反馈的考评体系”强制分布也就成了官样文章。对于我们 HR 从业者来说，如何判断在贵公司坦诚管理哲学的普及程度，只需回答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有多少人接受过面对面的、诚实坦白的绩效反馈面谈？这些面谈让员工弄清楚自己还需要做哪些改进，自己处于公司的什么位置上。”

“75%与人相关，25%与其他因素相关”、“首席解释官”是韦尔奇的领导力哲学的表现；花大力气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明星离开 8 小时内任命他的替代者”反映的是韦尔奇组织与人的权力博弈哲学——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华为的分配与考核机制是任正非“以奋斗者为本”而不是“以幸福为本”的管理哲学的配套……HR 教育工作者必须帮助从业者去厘清“术”与“道”的关系，了解管理方法背后的管理哲学土壤而不是沉迷于各种眼花缭乱的“炫技”，防止简单的生搬硬套。HR 教育工作者还要帮助从业者去构建自己的贯穿性哲学体系，唯有自己相信才能说服自己、才能坚定践行。

我反对在 HR 教育工作中对“知”和“行”进行划线和分离（只需学会“HOW”，不需了解“WHY”），我也反对各种傻瓜式操作技能教学，这些任务大可以交给蓝翔技校去完成，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没有系统观念、没有贯穿性管理哲学指导的 HR 可以完成管理制度体系的有效设计。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如果脱离了管理哲学体系的定义，一切都是灰的。HR 教育在教授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同时必须帮助教育对象定义这些技术背后的管理哲学，这是我坚持的第三条人力资源教育观。

以总结我的 HR 教育观纪念杰克·韦尔奇，是希望我辈身处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中还能保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学习心态，也是对 HR 从业者善意的提醒：如果 HR 和企业关乎“赢”的能力无关、如果 HR 对企业资源配置没有决策价值、如果 HR 不能

致敬杰克·韦尔奇

定义企业的管理哲学，那么 HR 也许真的会成为“20-70-10”规则下的 10%，而 HR 教育与咨询也将是彻底的失败！

第一章 完善新冠疫情国际合作机制 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持续变革

牛华勇¹

2020年伊始，中国遇到了来自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严峻考验。到2月底为止，在全国上下的努力下，疫情已经进入了平稳期。尽管在疫情初期，我们由于准备不足，出现了一些应对中的问题和困难，但在各级各部门的努力下，防疫工作迅速步入正轨，目前，已经明显地阻止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趋势，全国大部分省市已经没有新增病例，各地有序复工也已经逐步展开，大部分省份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已经超过60%，部分省份已经达到80%以上。

此次疫情，是对我国现有医疗水平、社会治理、经济韧性、公民素质的一次全方位的检验，也是对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建设成果的一次巨大的考验。经此一役，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也表现出了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有序的组织管理能力和高效的危机应对能力。疫情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稳定期，社会各界对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经作了深入反思，对我们采取的一些有效的措施进行了系统总结，正在对未来疫情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和展望。

从国际上来看，与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最近几天，疫情正在迅速地向全球各地扩散，包括我们的近邻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部分地区，以伊朗为中心的西亚部分地区，都在面临严重的疫情威胁。几个国家日新增确诊病例人数，已经持续几天超过了疫情最为严重的中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或卫生机构负责人，都出来警告说，他们的疫情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后面的发展情况尚未可知。世界卫生组织也反复强调，鉴于病毒的传染性，要尽全力阻止病毒向公共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传播。

病毒在全球的传播，短期内会对现有国际交流、国际贸易等造成一定的冲击，从长期看甚至会威胁到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治理结构。人们在关切地探讨疫情国际化有可能导致的结果。

首先，疫情爆发国会面临来自于国际社会严厉的隔离措施，包括对人员交流的隔离、贸易和物流的大幅度下降等，时间久了，会使疫情爆发国变成经济孤岛，甚至与全球市场产生

¹ 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等。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不可逆的脱钩效应，最终重塑全球价值创造平台。其次，国际金融市场会出现巨大的市场波动。2月24日以来，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三个交易日的严重下挫，投资者信心明显不足。如果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爆发比较严重的疫情，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是无法规避的巨大系统风险，有可能会引发下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第三，疫情的爆发会严重威胁部分国家内政和社会治理体系，有些国家和地区，有社会失序的风险，也可能导致政权的更迭、国际势力的角逐甚至地区冲突。

疫情能不能有效迅速地得到控制，取决于全球各国对病毒的认知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平心而论，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已经有效控制了局面的爆发国，在几周的时间之内，中国的疫情应对手册已经更新到了第六版，我们对病毒的认知在不断深化，无论是从医疗卫生角度，还是从社会治理、综合防控的角度，我们都是全球唯一的经验来源。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更大范围内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就有可能为全球防疫工作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让全球防疫工作化被动为主动。

冷静分析疫情全球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在近期可以推动的国际交流合作领域主要有：

一、利用南南合作机制，向高风险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系统的资源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止一次强调，一定要防止疫情向那些公共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传播。疫情一旦在这些国家散开，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是所在国家难以承受的。通过中国的公开数据可以看到，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医疗挤兑现象的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病人的死亡率能够高出几倍，这说明充足的医疗资源和恰当的社会管理，对于疫情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

从目前爆发疫情的几个国家看，日本、韩国、意大利均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自身的卫生系统也比较完善，虽然有不少人感染，但整体来说，死亡率较低。但伊朗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目前包括一位副总统在内的多名高官感染病毒，而其报告出的死亡率也比其他几个国家高出很多。相比之下，新加坡的防疫工作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新加坡采取的措施非常克制，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案例。这说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系统的发达程度，对抗疫来说非常关键。

目前疫情尚没有进入到包括撒哈拉以南地区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外的疫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情尚处于初期阶段，现在也还没有到乐观的时候。作为疫情的先行者，中国应该及早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中，提议对最不发达国家抗击疫情的系列援助倡议。包括共享抗击疫情的信息，提供诊疗方案和医疗物资的支持，提供紧急防疫技术培训，派出卫生指导专家，建立针对疫区的援助基金，向全球政府和企业界募款等。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施，都是人道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体现。

二、推动防疫进入二十国集团核心议题，提升全球防疫协调能力

二十国集团是当前全球多边合作体系中，最具代表性、平等性和时效性的合作机制。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可取代。多年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对话机制，努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就重要的全球问题进行磋商，并做出一致回应和行动。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下，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与会各国在此议题上形成了广泛一致。这次会议为《巴黎协定》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批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形成了气候大会和二十国集团两个并行又相互促进的多边推动机制。

此次疫情，建议我国可以借此机会，大力推动公共卫生议题进入二十国集团峰会议题。2020年，第15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沙特利雅得举办。沙特方面计划利用这次会议机会，进一步加强与其他G20成员国的关系，尤其希望能够通过本次峰会制定有效的政策，发挥沙特在中东地区和全球舞台的影响力。目前，沙特的老对手伊朗疫情严重，疫情也在不断地向周边国家扩散。中国如果在此时提出建议，通过中国的先行者身份，利用二十国集团的平台，提升疫情应对议题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的重要性，形成全球对抗疫情的基本原则、协调机制和行动纲领，必将得到包括沙特在内的各个主要成员国的支持，并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三、资助学术机构、智库、非盈利组织开展境外国际性学术活动

此次抗疫斗争中，中国大量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智库等，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了相关研究中，包括病毒机理、诊疗方案、社会治理、政策应对等，产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未来国际社会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通过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性活动，将这些观点在全球广泛传播，会极大地提高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全球的能见度。

建议学术活动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应当考虑拓宽学术活动经费的来源和资助途径，鼓励中国的企业家通过合理方式进行民间资助，即使是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提高使用效率。比如，通过合理方式，资助设在境外的非盈利组织、研究机构或学者个人，鼓励国内机构到海外或与海外机构合作举办与疫情防控主题有关的国际学术活动，在英文报纸、期刊、媒体上发表更多的介绍我国经验与做法的文章。

建议借此机会，作为天然的宣传平台，号召全球孔子学院普遍召开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以疫情为基本议题的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的讨论，容易被所在社区和学校接受，也同时逐步推动孔子学院学科化，帮助孔子学院在未来的全球学术竞争中提升竞争力。

总之，以本次国内疫情的转机为契机，我国应当主动设定议题，并通过各种双边、多边机制，在我们前期工作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推广，推进国际社会对抗疫情的共同解决方案，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二章 抗击新冠疫情与中日韩三国合作

禹辰勋²

一、新冠疫情的冲击

2003 年的 SARS 传播并没有跑出东亚地区而悄无声息，这次新冠疫情却蔓延迅猛，在各国都有发现，成为国际社会公敌。中日韩三国发现的感染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三国的防疫体系和宏观经济运营能力以及国民素养都在经受着考验。从中国经济体量来看，2003 年的 SARS 期间，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比重为 4.3%，2019 年该比重达到 15.8%。同期，中国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也从 5.3% 提高到 11.7%。此外，中国的出境游客数量 2003 年约 2000 万人，2019 年则达到了 1.6 亿人。201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率已经达到 27.4%。2003 年到 2018 年期间中国引领世界 GDP 增长 28%，该数据比美国和印度的合计还要大。这说明，因为本次疫情中国经济增长一旦受影响，不仅仅是中日韩三国和东亚地区国家，国际社会受到的打击也将远远超出 SARS 时期。

从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来看，目前中国供应中间材料最多的国家依序为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世界 5 大制造大国都属于本次疫情的影响圈之内。中国的电子、机械、汽车配件和化工产业中间材料的三大出口对象国分别有美国、韩国和日本。所以，一旦中国的中间材料供应能力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实际上，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保护主义思潮一直笼罩着世界。所幸中国起到了全球生产及消费中心的作用，全球经济勉强维持了表面上的增长现象。本次疫情的扩散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且目前为止没有确实的预防方法和治疗药品，不安情绪在持续扩散。一旦疫情扩散到全世界，定会影响全球生产和消费，各国的量化宽松和降息等一系列政策难以发挥预期效果。也就是说，供应和需求同时减少时，相关政策很难发挥作用。

本次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内需临时冰冻，各地的部分工厂停止了运作。国际油价下跌，全球供应链受到连锁性冲击，中国周边国家的工厂也停止转动。另外，2018 年中国公民海外旅游消费规模曾达到 2800 亿美金，此次突发性的疫情将大大折损世界各国的旅游产业和相关的就业岗位。中国春节是一年中消费需求最为旺盛的时期之一，疫情的来袭无疑给整个

² 禹辰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中日韩合作论坛(CJK Forum)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中韩经贸合作、中日韩战略合作等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众所周知，服务业在中国 GDP 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达到 54%，而 2003 年仅为 4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70%。这说明比起 SARS 时期，中国经济对服务业和消费的依存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此外，中国企业正饱受着保护主义和中美贸易战，全球经济活力低迷，产业结构调整三重考验，而本次疫情带来的服务业萧条和消费钝化无疑是雪上加霜。

作为对中国出口依存度达到 25% 的国家，韩国也将无法避免其直接影响。中国的消费心理萎缩，产业生产恢复缓慢，这将会导致中间材料及消费材料为中心的中国出口减少，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经营状况必定恶化。韩国的产业链已经和中国经济环环相扣，中国中间材料一旦停止供应，韩国的成品生产也会中断。尤其是中国占韩国旅游收支的比重已经从 2003 年的 14% 提高到了 2019 年的 48%，此次疫情中中国游客减少必定给韩国旅游业造成很大的冲击。日本的疫情一旦加剧，对中国出口也将会减少，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也将无法独善其身。目前，全中国范围内以制造业为主大概有 1900 家日企，汽车配件方面中国产的进口规模已经达到全球进口总量的 37%。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消费占全外国游客消费总额的 40%，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疫情扩散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日本一直把东京奥运会当作实现日本经济再一次复兴的跳板，非常担心奥运会被延期或者取消。

二、三国应对措施

中国是否尽早克服疫情也对日韩两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暂且认为本次疫情时间不会长，不会超过第一季度时间段。但如果三国的防控工作和协作欠缺而导致疫情持续，将对三国制造业的生产计划和促进消费造成较大的影响。目前，三国政府主要关注点是疫情防控，但也在筹备着疫情告捷后的经济稳定及复苏等。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且逐步见效，在筹备降息，扩大流动性供应，基础设施投资与减税等财政及货币政策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正常化”。微观上减少企业的流动资金缺乏问题，尽量恢复物流，让员工尽快回到生产活动当中。随着疫情逐渐趋缓，中国政府下令复工复产，国营企业和大公司正在逐渐恢复生产，而部分中小微企业若想完全走出疫情后的资金难、员工难的困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韩国和日本除了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疫情造成的国内经济萧条困局外，为中小企业提供可缓解流动性困难支援。韩国采取追加国家预算，一方面筹备强化防疫机制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支援小商人、中小企业恢复经营正常化，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方面受到的冲击，稳定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国家的民生及就业。日本也在为当前经营困难较大的旅游企业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救济支援。尽管三国都在实施量化宽松、降息和减税等措施，当前最为紧迫的是中小微企业的救助以及产业供应链和物流链的恢复。采用‘小钳子(pincette)’方式集中扶持也许更为重要。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失业率上升，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三国克服疫情、恢复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稳定局面，无论是对三国还是全球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国代表了全球总人口的 21%，全球 GDP 总量的 23%，全球贸易额的 19%，全球专利申请数量的 60%，而在占据东亚地区国家 GDP 的 91%。如果三国经济复苏不理想将会影响东亚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增长活力。因此，三国应尽快结束眼前的疫情，这对三国政府和民间合作以及相互包容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三、三国合作方向

三国的疫情得到控制后，首先是各自总结本国的实践错误和经验，其次应通过三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联防联控，推进三国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等疫情告捷后，三国有必要加强传染病发生及扩散方面合作机制。2019 年 12 月，在韩国召开过第 12 届三国卫生部部长会议，三方再次认识到考虑三国的地理邻接性和人员交流，经济交流增加的因素，有必要建立疫情爆发时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机制。同时为了共同抗击禽流感及传染新病毒，通过修改‘共同行动计划 (Joint Action Plan)’，增加了危机情况下对话的重要性及风险评估方面的合作以及三国之间对话机制的构建。基于本次疫情抗击的经验，今年在中国召开的三国卫生部部长会议中，三国将会建立更系统的对话及行动机制。传染病无国境，有可能给区域造成持续的威胁。为了共同的预防和应对，三国应建立防疫部门合作机制。三国已经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为了预防威胁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新型病毒再次出现，可以考虑定期的防疫合作训练。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今年在韩国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中，三国领导可以相互交换意见。

二是三国均为 IT 强国，基于抗击疫情经验，三国今后针对传染病预防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数字技术方面开展经验交流和相关技术的共同研发。例如，通过 AI 技术快速对疑似患者进行 CT 诊断，研发疫苗和治疗药品，基于 5G 技术和云计算的医疗机器人研发，针对早期轻症患者进行远程诊断的系统，通过红外线检测体温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相结合等等。三国应利用自身的 IT 技术和庞大的市场，可以采用本次疫情中所积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累的应用经验并加以完善，这将有助于对开拓相关技术的国际市场，加上能帮助医疗体系比较落后国家传染病的预防和防疫。

三是中国和韩国有必要参考日本的‘商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简称BCP）’。BCP是作为灾难、灾害、疫情应对经验比较丰富的日本为了加强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连续性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即，假设一种灾难、疫情后发生供应链断裂，工人停工停产的紧急场景，制定出可以保证持续经营的方法和方式的计划。这是由中央部门印发BCP指南，各机关和企业基于指南编出各自的BCP。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危机情况下的弱势群体，依照企业BCP计划经审查通过后提供税制优惠、金融支持，优先支付补助，提供专家指导等财政及非财政支持。而大企业将BCP应用于供应商危机管理体系中，以保证大企业稳定的生产活动。当前，三国之间的产业供应链丝丝相扣，无论出于三国之间稳定的贸易投资合作考虑，还是“中日韩FTA协定”的签署，三国的供应链不能发生大幅度动摇。因此三国有必要研究‘三国共同BCP方案’以及‘三国共同供应链管理(SCM)’体系并构建相关的系统。

四是进一步促进三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基于“三国电子商务共同研究”，今后需要改善电子结算和送货及保护消费者信息等问题，扩大三国之间的‘数字自由贸易’。本次疫情结束后，作为亚太地区电商市场引领者，三国的电商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2003年爆发SARS时，中国的电商市场开始迅速发展，淘宝也在抗击SARS时期的2003年5月份正式启航。本次疫情为契机三国消费者的网购行为将进一步扩大，三国之间的网络销售渠道和物流系统构建以及相关科技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也会加快。

三国将通过三国之间的灾难、灾害、疫情的共同合作与研究，可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三国经济体系及社会不稳定的顾虑。不但可以加强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三国之间还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合作、商务交流、旅游产业造成的消极影响。此外，除了构建三国防疫机制之外，加强国际合作，以预防应对国际性传染病。尤其是一同合作推进应对卫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传染病，为地球村的健康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虽然疫情来势汹汹，但是中日韩三国经济的基本面很扎实，完全有能力打败疫情并恢复经济增长。正所谓“雨后地更坚”，通过本次疫情，三国之间的合作与相互理解必定有更深入的发展。

第三章 让疫情成为中日韩三国关系全面修复的新契机

曹雪城³

去年12月中下旬，武汉突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短短两个月间，疫情迅速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确诊病例迄今已接近七万人，死亡近两千人，可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都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与此同时，由于同中方人员交流密切，近邻日韩两国也先后确诊大量病例，成为海外疫情爆发的重点地区，其中又以日本为甚。面对危害巨大的共同“敌人”，中日韩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而此时也正是三国摒弃前嫌、携手应对、全面修复关系的最佳时机。

中韩关系自2016年“萨德”事件跌入谷底后，一直徘徊不前。而受历史、领土问题长期困扰的中日关系也不温不火。日韩关系近年来亦因二战劳工和经济制裁等问题持续恶化。中日韩三边关系呈现出经济融合，政治分离的不匹配局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三国难以找到高度一致的发展目标，同时又在政治、军事上缺少互信，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但此次疫情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弥合创伤、增强互信、拓展共同利益的良好契机，如果从官方到民间，从高层交往到公共外交等多层面加以推动，相信会对打破三边关系僵局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加强疫情信息共享，重要资源互通有无

得益于中国科学家高超的科研水平和夜以继日的努力，中国在疫情爆发后不到七天就成功分离出病毒毒株并研制出检测试剂，第一时间对外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此举得到了外界广泛赞誉，也可以说使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阶段性成果。因而建议及时向日韩两国提供疫情和病毒相关信息乃至重要科研成果，助力其疫情防控工作，利用好我们的“先发优势”。此外，根据近几日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的走势来看，中国内地的疫情基本已进入中后期阶段。随着节后复工工作的有序推进，中国制造的优势将很快显现。防护服、口罩、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核心物资短缺的情况，相信很快就会得到缓解。日韩两国的疫情发展虽然还处在前期，但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已经开始出现口罩

³ 曹雪城，北京外国语大学佛山研究生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区域等问题等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等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因此，未来可以在满足国内必要需求的前提下，优先向日本、韩国出口甚至捐赠符合其标准的防护用品，尤其是国内已应用成熟的检测试剂盒、药品甚至疫苗等物资，以体现雪中送炭之意。

二、发起公共危机共同应对机制，吸收共同利益议题增进互信

此次疫情显示出高度的跨国传染性，已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病例主要集中在中国，但中日韩三国公共卫生系统都在面临重大挑战，难以独善其身。中方宜效仿 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亚洲共同基金构想，借此建立包括公共卫生议题在内的东亚或亚洲公共危机共同应对机制，加强从危机管理到军事医疗等层次的交流合作。中日韩官方合作平台大多集中于政治、经贸等传统领域，公共安全作为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范畴，其合作敏感度较低、范围更广，更易达成一致，也更易惠及普通民众。加之近年来韩国 MERS 疫情，日本福岛核泄漏等跨国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越来越需要三国间的高度协调和通力合作。未来可逐步纳入环境污染、恐怖主义、信息安全、卫生保健、人口老龄化等中日韩三国所共同关注的议题，常态化运作，进一步夯实共同利益基础，增强交流互信。

三、提前准备做好疫后公共外交，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发声互助

疫情在中国爆发后，日韩两国在本国同样出现疫情的情况下依然对华援助、捐赠大量物资，客观上有效提振了，其国家形象和普通人对于日韩民众的认知，这一点在日韩两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下的评论中可以得到印证。从首尔市长用中文为武汉加油，到日本执政党议员每人为中国捐款 5000 日元；从日本捐赠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韩国某大学官网打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中文标语。日韩从官方到民间的一个个“暖心之举”确实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三国民众之间的距离。习近平主席曾在 2017 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说：“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此次共同抗役确实为三国提供了“民心相通”的基础，也是中方开展对日韩公共外交的良机。既可以利用境内外社交媒体广泛宣传三国互助的真实案例，也可以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团体、个人根据疫情发展情况积极向日韩捐赠。甚至可以将明年设为“中日韩旅游年”，鼓励三国民众相互访问交流，更多从民间层面体现灾后对彼此的信任和支持。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尽管此次疫情中中日韩三国间所展现出的危急时刻携手互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韩三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但无疑为未来如何求同存异，筑牢共同利益，增强政治互信，促进三国人民间的理解和再认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全新的视角。从挑战中发现突破点，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以更开放、包容、多元的姿态对待三边关系发展，将中日韩打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范本。

第四章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完善金融治理体系

孙莎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三个方面，为完善我国金融治理体系提供思路。

一、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金融影响

显而易见，疫情的爆发会导致中国经济总量的下滑。从需求端来看，一是消费总量减少，消费结构从线下转为线上。一方面，由于疫情停工，居民的收入大幅下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人们隔离在家，以往在外的交通、餐饮、住宿等消费被迫取消，实体店购物消费、线下服务消费也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线上消费。不仅是食品和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采购转到线上，还有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新兴线上服务消费兴起。二是疫情期间投资规模减少，而疫情结束后部分已确定被拖延的投资项目可能会重新执行。除了医疗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大多数企业生产、投资计划被迫中断，难以短期内产生新的投资需求。但是，疫情并不会取消投资需求，只是将其延后。三是净出口大幅下降。受疫情停工停产影响，中国出口大幅减少，进口受影响不明显。从供给端来看，各地封路、居民隔离，使得劳动力停工、生产资料运输不畅以及企业停产，生产进入“休眠”状态，总供给大幅降低。

对于金融领域，疫情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分别带来影响。一是投资者信心受挫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重症率高，确诊病例数量庞大。此次疫情会持续多久？隔离、封路等措施何时才会解除？企业复工复产率有多少？中国经济下滑幅度有多大？投资者对于这些问题心怀疑虑，信心受挫，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二是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大幅下滑，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造成金融风险累积。部分企业依赖收入进行还贷，而疫情的冲击使得这些企业无法赚新钱还旧账。大量居民在疫情期间被降薪，甚至被迫裁员零薪，难以维持房贷、消费贷。因此，银行业、互联网金融行业等相关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随之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多数中小银行在疫情

⁴ 孙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金融系讲师，主要研究影子银行、货币政策、金融市场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前已经面临着公司治理不善、信用风险累积、期限错配严重等普遍问题。如，2019 年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锦江银行经历同业“挤兑”危机。此次疫情负向影响的叠加，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风险累积，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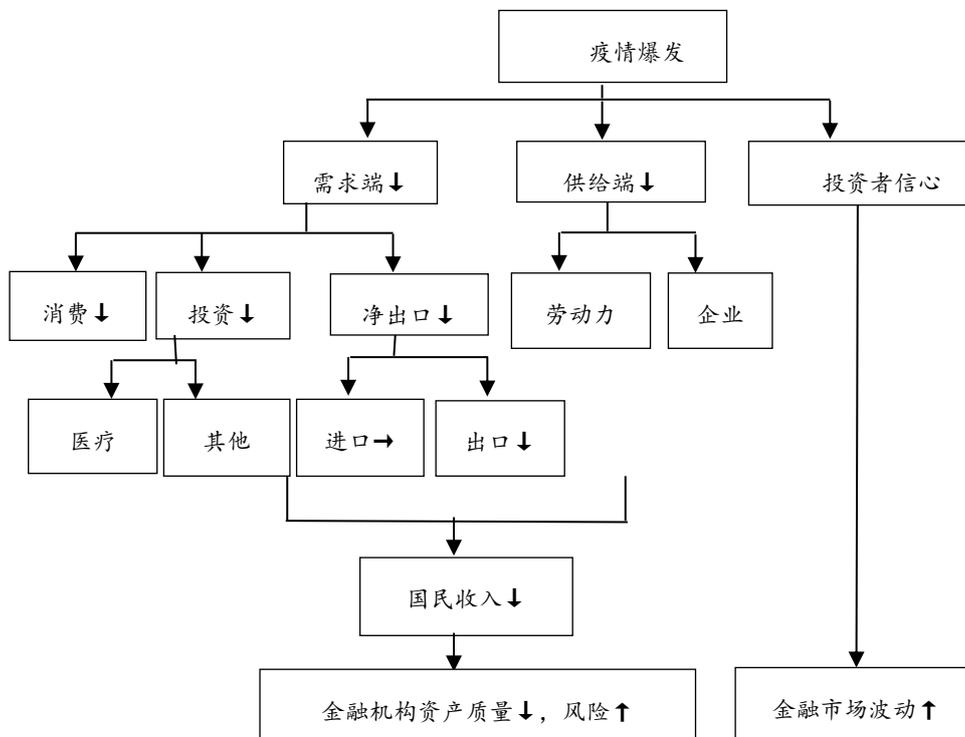


图 4-1 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二、应对疫情冲击，金融领域已出台的政策与措施

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国际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 3 月初分别提供 500 亿美元和 120 亿美元的紧急融资支持。国内层面，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陆续发文，推出了以下三方面的政策：一是合理延后还贷安排，及时缓解企业和个人流动性困境。二是适当下调贷款利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三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有针对性地支持重点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一定的逆周期需求侧调控是有必要的。从此次已出台政策来看，无论是金融监管容忍度，还是货币政策立场，都在边际放宽。但是，结合考虑杠杆率、通胀预期等多重因素，应注重把握货币政策的度。此外，已出台政策还着重强调了货币政策定向的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资金注重服务于疫情重点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国内外主要金融支持政策的梳理如表 4-1 所示。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表 4-1 疫情期间国内外主要金融支持政策

机构/信息来源	时间	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月2日	提供紧急融资、扩大现有贷款、债务减免优惠、新的融资安排等支持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月4日	通过快速发放的紧急融资机制，为可能寻求支持的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约 500 亿美元。
世界银行	3月4日	提供 120 亿美元资金支持帮助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银保监会	1月26日	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调低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	2月7日	设立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通过主要的全国性银行和湖北等重点省份的部分地方法人银行，向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综合低成本贷款利率和财政部贴息，确保重点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降至 1.6% 以下。
中国人民银行	2月17日	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2000 亿元，利率较上期下降 10 个基点。
中国人民银行	2月20日	1 年期 LPR 下调 10 个基点至 4.05%，5 年期以上 LPR 下调 5 个基点至 4.75%。
国务院	2月25日	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付息可延期到 6 月 30 日，并免收罚息。
国务院	2月25日	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5000 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
国务院	2月25日	政策性银行将增加 3500 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放。
国务院	2月25日	国有大型银行上半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要力争不低于 30%。
国务院	2月25日	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2.5%。

数据来源：IMF 官网、世界银行官网、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国务院官网、银保监会官网、choice 数据库

三、应对疫情冲击，完善金融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此次大规模疫情突发事件对我国治理体系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具体到金融领域，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应对突发性疫情冲击，金融应如何及时、切实且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长远地，我们还需关注：在纾困实体经济的同时，金融业应如何有效管理自身风险，防范未来可能的危机？结合以上问题，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笔者从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三个方面着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一）精准把握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提升金融体系适应性

高度适应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可理解为金融服务要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匹配。在此次疫情中，哪些行业受到疫情冲击大？哪些企业面临着流动性困境？哪些企业融资需求强？对于这些问题能不能精准回答，直接决定了政策施力点的准确性和政策实施后的有效性。可以尝试采用企业家问卷调查、金融机构大数据分析等方法获取融资需求数据，助力政策制定。

（二）积累疫情应急管理经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提升金融体系竞争力

竞争力是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体现。一方面，此次疫情突发是对我国金融体系能否在非正常时期应急稳健运营的一次难得的实践检验。经历此次疫情，我国金融体系能够在公司治理、应急运营管理等方面积累宝贵的经验、获取一定的教训。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企业和个人收入下降已经使得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扩张信贷、为客户安排延后还贷。这样“雪中送炭”的做法实际上为金融机构自身积累了风险。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应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可结合数字化、科技化手段，提升贷后风险预警能力。金融机构可绑定用户数据，收集用户交易信息，及时预判风险事件。

（三）发挥金融科技功能，提升金融体系普惠性

普惠性体现在此次疫情中可理解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多样化融资需求能够普遍地、真正地落到实处。政府提升金融体系普惠性，可以走两条路：一是采用传统方式，如以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为渠道，以再贷款的形式，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资金。这也是目前政策已经发力的点。二是发挥金融科技的功能。金融科技功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不受地理位置的局限，即使在疫情隔离期间金融业务仍可顺利进行。另外，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往往交易量小、风险高、收益不确定性强。金融科技利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统计的方法对借款人进行精细化分析和判断，更准确地实现信用测度和定价，为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设计更合适的产品。

第五章 疫情恢复期如何发挥市场的力量

韩睿兮⁵

2020年一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由于春节假期和春运的影响，疫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封闭离汉通道、延长春节假期、错峰复工等。疫情的发生对经济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需求中消费、投资、出口都下滑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方面要打赢疫情的“狙击战”，也要打赢生产复工的“反击战”。

中国经济自2017年以来，经济出现持续出现下行。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渐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短期受到金融去杠杆等政策的影响，导致货币传导机制不畅。外部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虽然我们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尚未完全解决。进入2020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会在非洲猪瘟疫情后进一步加剧。服务业在一季度受到重创，但是制造业的损失比服务业的损失更大，因为它不仅仅是账面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结构上的损失，制造业一旦完全停下，再想启动十分困难。短期内我们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长期我们还有实现“中国梦”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要想顶住下行压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最有效的办法是，激活市场本身的动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重要的论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疫情的恢复期的经济生产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给“看不见的手”松绑，防止出现政策上的一刀切

四十年前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可以简要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内开放，对外放开。”对内我们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尊重市场的主体，特别是尊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他们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在经济政策上，我们要防止出现“一刀切”的现象，“一刀切”政策的优点是可以防止违法违规操作和权利的滥用，但是缺乏政策的灵活性，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生产方面的政策权限适当下放给地方，由地方根据本地的条件和情况选择和制定方案。如，去

⁵ 韩睿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杠杆不能笼统的，而应该更加有针对性。让真正的僵尸企业出清，而不是让中小微企业感到融资困难。允许国五国六标准汽车上牌，不能制定强制性的标准不允许所有国五标准的汽车上牌，放松一部分限购措施，刺激居民汽车消费。

二、技术推动经济发展，构建信息透明市场环境

关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暴露出比较大的短板。经济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如何解决信息的对称性问题，以及信息透明度问题，让价格形成更公平，让交易更有效率。建议相关部门加快研究探索金融科技的运用，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获取完整、快速加工涉及企业、居民的社会信用信息，最终建立能够抵御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的金融运行环境和体系。

三、合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防止出现债务危机

未来财政政策要更加有针对性，给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是首要任务。货币政策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既不能搞“大水漫灌”，也不能出现货币政策的急剧转向，货币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一方面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也要为中小微企业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解决他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我国 M2 存量已经超过 200 亿，面临比较大的通胀压力，货币发行容易刺激房地产市场，要保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目前中国积累的大量的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容易引发地方债务危机。我们要防止发生这种现象。

四、化为危机，以武汉为中心，重启“中部崛起”战略

利用全国将目光、人力和物力全都聚焦于武汉的时候，疫情结束以后，推动以湖北和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崛起”。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作为受益者的重庆和成都在 2019 年生产总值全国第五位和第九位，对我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格局是华中核心城市武汉排名全国第九位，华东南西北中，排名最低，作为北上广深渝蓉的中心点，和其本身的条件，这样的排名有些不合理。武汉作为此次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经济复苏的面临的挑战也越大，政策应向武汉和湖北地区倾斜。长期来看中部地区具有人口众多，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交通发达，实体经济活跃等优势。武汉作为抗击疫情的英雄城市，利用其九省通渠的地理优势，和大学生人数世界第一的人力优势，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是足以胜任的。中部的崛起有利于连接东西，形成东中西连接的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周边几省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充分发挥我们“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看不见的手”。

第六章 构建微观体育运动的激励机制 加快宏观体育产业的发展步伐

马天平⁶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并随着中国特色的春运高峰迅速流行至全球，疫情罕见令人窒息。根据中国CDC报告，患病者无法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强烈依赖于自身免疫力抵御。众所周知，病毒是影响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原体，抵抗病毒天然的屏障是免疫力的提高。那么如何提高免疫力？

体育运动无疑在免疫力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情况下，坚持体育锻炼会提高免疫力，提升健康水平，因为运动时增加的颗粒白细胞具有变形运动和吞噬活动的能力，从而降低机体发生感染的机率，也即是说细胞活性提高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同时，对于病毒造成的心理危机，体育运动能充分改善，因为运动激发脑细胞中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肽，这些物质与人的情绪、情感紧密相关，运动诱导人产生积极的思维方式，对于化解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积极有效。

可以说，体育运动改造身体的同时也在改造内心，当代体育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体育运动能为全社会增强宏观抵抗力。

尽管如此，很多民众还是没有体育运动的习惯，没有运动的动力。一个民众的运动是在需求基础上产生的，只有民众基于动机形成需求，才会进行体育锻炼。而微观个体体育锻炼需求被满足的过程，就是宏观上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过程。对于体育经济学而言，先促进动机、激发需求，再满足需求、实现供给，自然获得体育产业发展、国民经济增长。

因此，有必要对居民的体育运动动机实施激励，才能从微观机理上构建体育锻炼对疫情的抵御作用，宏观上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健康中国”的重大使命。我们如何为民众的体育运动建立激励机制？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是知名的激励理论，其刻画了“生理安全需求、社会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几个层次。在严重疫情到来时，中国政府最高层面也提出培育健康生活习惯的运动激励管理。

为了激励民众通过体育运动提高免疫，应构建民众运动与免疫变化的监测体系，对运动

⁶ 马天平，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商学院副教授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后免疫的变动情况及时分享、告知,使得民众知晓自己的运动参与度与免疫能力的提升结果。同时,应尽可能降低体育运动受到的干扰,一般当被问及为什么不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民众

经常的答案是缺乏时间。时间是商品、休闲是需求,因此体育的经济学需求,可以说是对休闲时间的需求。时间稀缺比任何收入稀缺对消费者体育需求的制约更大。因此政府可通过财政等机制提供更多室内体育运动场地,以抗击天气变化的干扰,实施稳定的体育设施收费来避免价格频繁调整引发的噪音,加大科技力度降低人工生产操作时间,修建更便捷的社区体育设施,规律开动的公共交通工具使得路况更优等因素,提升民众体育时间。

为了提高民众非免疫的运动动机,需要强调体育运动的乐趣性、社交性、友谊性等。具体包括体育荣誉机制、体育赛事机制、兴趣自主性机制和体育精神等。体育荣誉包含影响运动动机荣誉的各种因素,如获得资质、排名较高、成为明星等。没有良好的荣誉激励,会导致运动的激励难以长期化。当然,体育荣誉机制依赖于体育赛事机制,只有民众通过充分的比赛竞争,才能清晰自身的运动动机被定价。更进一步,这种体育赛事机制又受到市场完善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参与者的人数。而某项运动人数的增加,最重要的又是民众自发根据兴趣来参赛而不是外界被迫,这种兴趣的牵引,我们可以称为兴趣自主性机制。体育兴趣,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育,这又与教育治理结构和教育培育竞争相关。最后,尽管这些激励机制的建设都较为重要,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民众内生的体育精神,只有自身的自律、“自虐”、自我竞争精神长存,才能在运动激励管理上发挥长期作用,这无法计量但又具有终极约束作用。

从我国已有的体育政策和实践看,国家财政、产业等相关部门一直强调运动激励管理机制的构建,近几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及“建立群众性竞赛活动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全民健身服务和激励流程制度”、“完善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表彰激励机制”,以及2019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也强调“在政策范围内采取必要激励机制,支持相关改造”,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文件中也指出“强化考核激励,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特别强调“创新全民健身激励机制,搭建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全民健身激励平台,拓展激励范围,有效调动城乡基层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颁发体育锻炼标准证书、证章,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试行向特定人群或在特定时段发放体育健身消费券等方式,建立多渠道、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市场化的全民健身激励机制”和“强化激励、不断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创新使用评价激励机制”等，这正是国家政策对体育运动激励管理的重视。

一言以蔽之，运动激励机制如果能科学化、长期化地建立，则体育消费、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将不可阻挡。本次疫情的冲击，正是一次反向思考体育价值的机会，更是一次体育运动激励机制建设的契机。我们相信，反思的力度与机制的完善越强，体育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步伐将越快。

第七章 新冠病毒疫情下对国际资本市场法律风险与责任的思考

杨学群⁷ 姜华丽⁸ 李向阳⁹ 吴绣宇¹⁰

【摘要】在此次跨国性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影响下，对各国资本市场的发行人、投资者、投资顾问甚至是监管方等都产生了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风险。如何应对此次疫情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本文试图从中国、欧盟、英国、美国等主要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同主体角色做了不同的分析，以便涉外法律工作者更好地思考资本市场产生的法律问题并为客户提供综合的法律解决方案。

【关键词】国际金融 法律风险 美国 欧盟 英国

为维护中国资本市场甚至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受此次跨国疫情的影响，作为涉外法律工作者有必要在早期识别来自微观审慎层面的以及跨境和跨行业的潜在法律风险及各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便提出不同的法律策略，维护好不同客户的合法权益。

一、中国金融市场法律责任与法律风险

1、禁止操纵、扰乱证券市场

因本次疫情影响面积大、波及产业多，尤其对于重点疫情地区的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某些投资顾问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会利用此次持续不断的疫情对特殊地区餐饮、影视等产业做出投资建议或是利用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相关证券交易，从而进一步影响证券的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但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a）对证券、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b）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等方式来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同时根据《证券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在此次疫情期间，投资顾问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应加

⁷ 杨学群，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法学硕士，曾任派生科技、深大通等上市公司集团法务总监，现为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方向为涉外金融、证券投资、银行基金；

⁸ 姜华丽，现为山东众成清泰（威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

⁹ 李向阳，现为山东众成清泰（威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

¹⁰ 吴绣宇，现为山东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方向为国际贸易、公司纠纷、婚姻家庭事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强自身的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禁止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不得操纵证券市场、干扰证券市场；否则通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境外市场参与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

受本次疫情的影响，欧美等国证券市场都出现多次恐慌性下跌，若境外证券市场中的发行人、交易方、投资顾问等在发行或交易活动中，扰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则按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境外的发行人、交易方、投资顾问等对维护我国的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我国投资者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境外软件参与者对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义务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对外开放，更多的境外公募基金公司、国家主权基金、私募投资机构等作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交易中，所采用的对冲交易软件、量化交易软件等计算机程序自动生产或下达交易指令。根据《证券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者下达交易指令进行程序化交易的，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不得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秩序。

本次疫情波及各国，使得各国资本市场产生了连锁性恐慌交易反应，特别是对于杠杆化产品、反向衍生品等一旦触及平仓线或保底价格，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价格波动。境外公募基金公司、国家主权基金、私募投资机构等中国资本市场参与者，在利用计算机程序自主下达交易指令时，应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同时不得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正常的交易秩序。

4、跨境监管合作与涉外举证责任限制

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面对此次疫情造成的国际性的证券市场危机，只有加强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的合作，才能落实对境外操纵中国证券市场、利用交易软件干扰交易所系统正常交易等违法违规事件的监督和治理。

同时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对于跨境基金、存托凭证等涉外证券产品，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中国境内的发行人、管理者、投资顾问等有根据协议或境外监管要求向境外监管部门报告的责任。但针对此次疫情做专项报告前，发行人、管理者、投资顾问等必须征得证监会、外管局等主管部门的同意，避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二、欧盟金融市场法律责任与法律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趋于高度一体化及金融危机的传播风险，需要欧盟在全球层面上作出强有力的承诺。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由下列机构组成¹¹：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欧洲监管机构联合委员会以及成员国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构成。

此次疫情来势凶猛，从意大利开始已对欧洲诸多成员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对金融系统的稳定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下面从不同角度对欧盟金融市场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风险进行分析。

1.金融系统与系统性风险定义

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二十国集团之间紧密合作，从而确保欧盟就金融稳定事宜发表的意见受到相应的关注。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2/2010 号欧盟条例》第 2 条¹²的规定，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机构、市场、产品和市场基础设施；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系统发生扰乱并可能会对内部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消极后果的风险。所有类型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和基础设施均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系统重要性。

2.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法律职责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2/2010 号欧盟条例》第 3 条¹³的规定，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应履行下列职责：（1）确定或收集并分析所有相关和必要的信息，识别并优先处理系统性风险（2）当系统性风险被视为重大风险时发出预警，并在适当时公布该预警（3）为回应其所识别的风险，发出补救行动建议，并在适当时公布该等建议（4）对预警和建议的跟进行动予以监控（5）就与宏观审慎监控相关的事宜，与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

¹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239 页

¹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77 页

¹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79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第三国的相关机构协调行动等。

3.成员国或监管机构对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建议的跟进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2/2010 号欧盟条例》第 17 条¹⁴等规定，当重大风险事项发生时，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向一个或多个成员国、一个或多个欧洲监管机构或一个或多个国家级监管机构发出预警后，上述成员国或监管机构应向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以及欧盟理事会通知其所采取的行动作出回应；不采取行动的，应提供充分的理由。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认定其建议未得到跟进、或被建议方无法提供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何不采取行动的，应在遵守严格保密规则前提下通知被建议方和欧盟理事会。

4.疫情紧急情况下的行动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3/2010 号欧盟条例》第 18 条¹⁵、《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4/2010 号欧盟条例》第 18 条¹⁶、《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95/2010 号欧盟条例》第 18 条¹⁷等规定，如果发生可能严重危害欧盟金融市场有序运行和诚信度或整个或部分欧盟金融系统稳定的不利变化状况，则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和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都应积极促进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协调相关的国家级监管主管部门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或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认为可能会出现紧急情况，均应向欧盟理事会发出保密建议，并附对应紧急情况的评估。欧盟理事会判断存在紧急情况的，应立即向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发出通知。

同时根据第 1093/2010 号欧盟条例第 25 条¹⁸、第 1094/2010 号欧盟条例第 25 条¹⁹、第 1095/2010 号欧盟条例第 25 条²⁰规定，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和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都应促进并积极参与下列各项的制定和协调工作：紧急情况下有效、

¹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93 页

¹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263 页

¹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403 页

¹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543 页

¹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273 页

¹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413 页

²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553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一致的恢复和清盘计划和程序,以及将任何金融机构倒闭的系统性影响降到最低的预防性措施。

5.成员国或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1) 通知义务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10/78/EU 号指令》第 6 条 (5) 款²¹等规定,如投资公司在任何第三国设立机构或提供投资服务和/或进行投资活动时遭遇普遍性困难,则其所属成员国应通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

目前疫情下,不论是投资公司的员工上班,还是投资公司经营、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等,都会遇见很多困难;则投资公司所属成员国应将该等事项通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

(2) 对投资公司的阻止义务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10/78/EU 号指令》第 6 条 (27) 款²²等规定,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尽管母国主管部门已采取措施,或由于事实证明采取的措施不充分,投资公司继续以明显有损东道国投资者利益或妨碍市场有序运行的方式行事的,东道国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保护投资者和市场有序运行所需要的一切措施,包括可以阻止违法违规的投资公司在其境内启动任何其他交易。

此外,东道国主管部门可将该等事宜移交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可依照《第 1095/2010 号欧盟条例》第 19 条所授予的权力处理。

(3) 对投资公司的附加要求

根据《欧盟委员会第 2006/73/EC 号指令》第 4 条²³的相关规定,在本指令未能充分化解投资公司与投资者保护的特定风险时,各成员国可以根据 (a) 为应对特定风险对该成员国的市场结构状况 (b) 该风险或问题日趋明显、且欧共体现有的措施没有以其他方式加以监管的,则各成员国可以对投资公司施加附加管制要求。

(4) 对存款人、投资者的保护义务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10/78/EU 号指令》第 9 条 (10) 款²⁴等规定,在履行

²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53 页

²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67 页

²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法律出版社【2010】,第 191 页

²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99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第 30 条规定的程序前,东道国主管部门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其他服务对象的利益。东道国主管部门应尽早通知欧盟委员会、欧洲银行业管理局以及其他所涉成员国的主管部门采取了上述措施。

6.与中国等第三国的关系

根据《欧盟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金融工具市场的第 2004/39/EC 号指令》第 15 条²⁵的相关规定,在此次疫情下,如果欧盟内投资公司在中国或其他第三国设立机构或提供投资服务或进行投资活动遭遇普遍的困难,则其所属的成员国应通知欧盟委员会。

如果欧盟委员会根据提交给它的信息初步判断所涉第三国未给予欧共体的投资公司以有效的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甚至与欧共体给予该第三国的投资公司的市场准入相比较不对等,则欧盟委员会可向欧盟理事会提议给予其适当的核准与第三国进行谈判,为欧共体的投资公司争取对等的竞争机会。

7.公共机构的责任与指令不适用情况

当疫情不断恶化,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03/6/EC 号指令》第 6 条²⁶的规定,公共机构应当公正、透明地发布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影响的统计信息。

在诸如疫情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原因而对金融工具进行稳定操作或在回购计划中交易自身股票是合法的,该等行为本身不应视为市场滥用,即根据本指令第 8 条²⁷的规定,本指令的禁止性规定不适用于对金融工具进行稳定操作或在回购计划中交易自身股票的行为。

8.中期管理说明书对疫情影响的说明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04/109/EC 号指令》第 6 条²⁸的规定,在不影响第 2003/6/EC 号指令第 6 条的情形下,股票获准在受监管市场交易的发行人应在每个会计年度上半年期间内公布一份管理说明书,在该会计年度下半年期间内公布另一份管理说明书。该说明书应提供在报告期内发生疫情产生影响的各类重大事件以及该等事件对发行人及其受控企业财务状况影响的解释,以及对发行人及其受控企业在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业绩的总体说明。

页

²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法律出版社【2010】,第 55 页

²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证券监管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21 页

²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证券监管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23 页

²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证券监管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177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9. 信用评级的调整与影响

信用评级机构通常在两方面被认为是失效的，一是信用评级机构未能在其信用评级中及早地反映出市场状况的恶化，二是随着市场危机的不断深化，信用评级机构未能及时调整其所做出的信用评级。

受此次跨国性疫情的影响，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1060/2009 号欧共体条例》第 8 条²⁹的规定，当信用评级活动使用的方法、模型或关键评级假设发生变更时，（a）信用评级机构应立即披露信用评级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b）尽快并最迟于变更发生后半年内复核受影响的信用评级，同时将该等评级列入观察（c）复核后发现，变化产生的整体综合效应影响了信用评级的，所有基于该等方法、模型或关键评级假设得出的信用评级均应重新进行评级。

三、英国金融市场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

根据《英国 2010 年金融服务法》³⁰的规定，金融稳定目标为有助于保护和加强联合王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金融服务管理局在考虑该目标时，必须（a）考虑联合王国金融系统不稳定对联合王国的经济和财政造成的后果（b）为实现该目标实施的任何行为对联合王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c）联合王国境外的事件或情况对联合王国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此次跨国性的疫情，联合王国境外的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事件间接影响联合王国的金融稳定，拟上市公司发行人、金融服务管理局等有义务履行相关法律职责，下面分别论述。

1. 补充上市公告书

受疫情的影响，将对拟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预期利润、市场发展前景等造成重大冲击，拟上市公司应根据《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81 条³¹等规定作出补充上市公告书，即发生重大疫情后，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利润和前景展望等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应就该变化或新发生的事项制定补充上市公告书，提交主管机关批准后，予以公布。

2、虚假或误导性公告书的赔偿

上市公告书负责人对于公告书中遗漏了在发生重大疫情后，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财

²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欧盟证券监管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2013】，第 319 页

³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943 页

³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131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务状况、利润和前景展望等发生重大变化所作的说明，则根据《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90 条³²等规定，该公告书负责人有责任向该公告书适用的证券的投资者进行赔偿。

3、价格稳定规则

根据《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144 条³³等规定，根据疫情的发生情况、方式、发生时间点等情况，为了稳定规定种类投资的价格，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可以采取行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采取的价格稳定规则仅适用于获得授权人而制定，并且对于不同类型的投资可以作出不同的规定。在此次疫情影响下，整个金融市场震动较大，金融服务局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作出不同的价格稳定规则策略，以维护英国金融市场长期的健康发展。

当然英国财政部可以颁布法令，对依照本条制定规则的权力进行限制。财政部颁布的法令可以特别（a）规定价格稳定规则可以对何种投资作出规定（b）规定只有在命令规定的时刻或期间内，价格稳定规则才可以对为了维持投资的价格而采取的行动作出规定等。

4、金融服务补偿计划

金融服务管理局必须订立相关规则，建立补偿计划，在相关人无法或可能无法满足针对其提出的索赔要求时向索赔人提出补偿。根据《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214 条³⁴等规定，该补偿计划特别可以规定：（a）在何种情况下认为相关人无法或可能无法满足针对其提出的索赔要求（b）为满足不同类型的索赔要求设立不同的基金（c）在不同情况下征收不同的费用（d）在规定情况下全部或部分偿还征收的费用（e）提出索赔要求应遵循的程序（f）索赔要求最终确定前临时支付的补偿（g）将对索赔支付的金额限定在规定的最高金额或以规定方法计算的最高金额等。

面对此次疫情传播广，将会导致英国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甚至是停业，这样必将导致劳动纠纷、房屋租赁纠纷、应付账款纠纷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英国金融服务局针对上述情况应建立不同的补偿计划，设立不同类型的补偿基金，制定不同的补偿方案，以满足各类索赔人的不同需求。

³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143 页

³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225 页

³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357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5、国际义务

根据《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410 条³⁵等规定，受国际疫情的影响，如果财政部认为相关人（包括金融服务管理局、投资交易所、获认可的结算所、申诉专员计划的计划执行人）拟采取的任何行动与共同体义务或联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国际义务不相容，则可以发出指令指示该人不采取行动。

从积极方面来讲面对此次国际化的疫情，如果财政部认为为履行上述义务需要采取相关人有权采取的任何行动，则可以指示该人采取行动。

6、向境外监管机关提供与金融稳定相关的支持

面对本次疫情带来的境外金融市场波动或所遇见的困难，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提出相关请求。根据《英国 201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 169A 条³⁶等规定，应境外监管机构请求，金融服务管理局可要求投资基金管理人、服务提供商等相关人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规定的信息、出示规定的文件。

四、美国金融市场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

1、系统风险概论

根据《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203 条³⁷等规定，对系统性风险的建议包括：

（a）对金融机构是否违约或存在违约风险进行评估（b）金融机构违约给低收入群体、少数种族或金融服务不充分社区的经济状况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c）对金融机构与其债权人、交易对手、股东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进行评估等。

2. 瘟疫等紧急情况下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影响

（1）对紧急情况的规定

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00.201 节³⁸的规定，自然或人为动荡发生之时或发生自然或人为动荡的紧迫危险出现时，即视为紧急情况开始。这些动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及其各州遭受的，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织或运行造成实质性扰乱的武装

³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687 页

³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法律出版社【2014】，第 1021 页

³⁷ 刘福寿 等译，《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第 61 页

³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上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257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攻击、恐怖袭击、内乱、火灾、瘟疫、龙卷风或洪水。

(2) 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现行组织、委托授权和规则的影响

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00.205 节³⁹的规定，在瘟疫等紧急情况下，现行有效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织说明、委托授权、命令、规则与规章均应保持有效。但如果主席或证券交易委员会授权作出或以主席或证券交易委员会名义作出任何法律规定或变更的，则应受该等法律规定或变更的约束。

(3) 委托授权

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00.203 节⁴⁰的规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履行职责或无行为能力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授予主席的管理证券交易委员会事务的权力等将按如下顺序（a）资历最高的委员（b）首席涉外法律工作者（c）部门主任（d）地区办公室主任，转移给排名第一顺位的可工作之人。

3.在并购重组中产生的法律风险

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29.903 节⁴¹的规定，在并购重组中投资者所面临的每项重大风险及影响，包括但不限于：（a）商业计划、表决权、现金分配政策、所有权形式或管理层报酬的变化（b）普通合伙人存在的与并购重组交易和与存续实体未来经营相关的利益冲突（c）并购重组交易中投资者获得的证券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并购重组交易中该等证券指定价值或存续实体的资产价值。

这次疫情会直接影响到并购重组案中商业计划的执行、管理层报酬、未来经营所带来的利益减损等，从而触发投资合同中的重大风险事项相关条款，导致发起人等向投资者进行理赔。

同时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29.904 节⁴²的规定，在并购重组交易中对任何一个合伙人产生的不同风险与影响，发起人或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明这些风险和影响对不同合伙人产生的不同风险和影响。也就是说在本次疫情期间发起的并购重组案或投后管理中的并购重组案，发起人应当向投资者或有限合伙人说明因新冠病毒疫情产生何种

³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上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263 页

⁴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上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259 页

⁴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下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739 页

⁴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下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741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风险以及将带来哪些潜在损失。

4.在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中的法律风险

(1) 特定因素披露

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29.1113 节⁴³的规定，在提供《S-K 管理办法》第 202 条规定的信息时，应阐述下列与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的特定因素，如（a）因严重疫情导致违约而触发的交易结构的任何具体变更（b）因疫情可能造成交叉违约或交叉担保的其他证券中的任何规定等。

(2) 中国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责任

如果资产支持证券由中国发行人发行，由作为中国资产的池内资产支持，或者中国实体为之提供本《AB 管理办法》第 1114 条或第 1115 条规定的信用增级或支持措施，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29.1110 节（e）款⁴⁴的规定，发行人提交文件中必须说明可能严重影响池内资产或其他事项的母国任何政府、法律、税务或相关重大疫情潜在因素。

5.信托契约下发行人的前瞻性陈述

当重大疫情发生时，对于信托契约发行人来讲，根据《联邦规章汇编》第十七编商品和证券交易第 260.0-11 节⁴⁵的规定，发行人需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中作出前瞻性陈述，或向证券持有人提供符合《1934 年证券交易法》的前瞻性陈述。该前瞻性陈述限于（a）对业务收入、亏损、每股收益或损失、资本支出、红利、资本结构等财务项目进行预测性陈述（b）对未来经营管理计划和经营目标的陈述等。

五、结论

受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断恶化而造成的世界影响，已经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资本市场的两大基石是诚信和信心。当严重的疫情影响各国投资者的信心时，就会演变出集体抛售、大幅度减持，甚至是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种种畸形的市场行为。种种市场交易行为又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从而亟需各市场监管主体、服务机

⁴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下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859 页

⁴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组织与通用规章》（下册），法律出版社【2013】，第 810 页

⁴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译，《美国 1939 年信托契约法及相关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与规章》，法律出版社【2015】，第 93 页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构履行相关职能以便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使得国家能够顺利度过疫情难关。

涉外法律工作者只有深入了解此次疫情所产生的各种法律风险点，以及从发行人、服务商、投资顾问到监管机构等各自的法律责任，才能做好资本市场的法律服务。更进一步地说，涉外法律工作者除了了解因本次疫情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法律风险和责任，也需要熟知欧盟、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市场各主体的法律责任，才能联动性地做好诸如境外基金、存托凭证、海外上市等境外资本市场法律服务。

第八章 COVID-19 to stimulate epidemic disease economy

Xu Deshun⁴⁶

COVID-19 is a mutual enemy of mankind, injuring people in Wuhan city and Hubei province,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2019, 2870 of China's COVID-19 infected population lost their liv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clud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governments are defending it cooperatively nowadays. COVID-19 will be defeated thoroughly in the near future definitely. Meanwhile, I think the epidemic disease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accelerated quietly and prosperously.

Epidemic disease economy, the term, was found originally in 2011 by an unfamous scholar who researched the 1918 influenza's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society and economy. Around 700, 000 Americans died in this miserable disaster, but now people seems to weaken the horrific event because it happened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Health care, telecommunications, entertainment, life insuranc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advertising industries relating with epidemic disease had been rebuilt. Since then, epidemic disease economic phenomena was arised in people's lives and academia. While human fights harmful virus and bacteria these years, many scholars consider the special economy to be developed gradually.

Flash forward to the present, I discover epidemic disease economy will have been becoming more popular. During COVID-19, the epidemic disease is the hottest topic for Chinese people. No matter who or what seems to be related to it. Furthermore, relevant industries, such as online retail, online health services, online education, online game, express and logistic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So I suggest that relative expert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n epidemic disease economics, including its scientific concept and definition, research

⁴⁶ The author is Dr. Xu Deshun,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Commerce, P. R. China.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objects and content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economics, supply and demand in its situation.

In my opinions, epidemic disease economics belongs to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t focuses four aspects at least, the first is re-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eople in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iving in harmony consists of person to person, person to nature, nature to nature, because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hardly surpass the power of nature; the second is modif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umer,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new constraints, labors and wages in new era particularly affect resource scarc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third is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government regulates the market, government will increase adjustments to the tool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the last is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 supply and consumer demand.

For instance, there are obvious influences in China because of COVID-19. First of all, dramatic decline of people's life quality i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People cannot move and communication freely. Secondly,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been hit hard directly. Operating income of tourism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1000 billion RMB approximatively, has decreased during Spring Festival (from February 4 to 10). Real estate revenue declines sharply and leads to a contraction in general budgetary revenue of Chinese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LGs) this year. On February 20, 2020, Moody's forecast is China economic growth will slow to 5.2% in 2020 from its previous forecast of 5.8%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normal economic activity resuming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quarter. However, some industries as I mentioned above have grea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view of these chan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lanning strategies accordingly. For example, China government is promoting to make PRC Bio-Safety Law and an economic-stimulus packag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In conclusion, I am sure epidemic disease economics will have stronger interest in research field and corresponding economy will be stimulated by COVID-19 not only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in China but also in other countries.

第九章 Supply Chain Fluctuation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Bingfeng Bai ⁴⁷

Since the end of 2019,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 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year “2020” marks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when China expects to build an all-round affluent society. Maintaining moderate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an important policy consider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stated recently, that it requir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resolutely eliminate the Pandemic, and strive to achieve both the go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year.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macro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s,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stabilize external demand in order to ensure a reasonable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achieve the 2020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sks.

COVID-19 impacts China' s economy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is usually short-term on the macro economy, often showing a V-shaped trend. Influenced by the damage from the disaster and market sentiment, economic growth declines sharp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as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disaster is gradually managed and controlled, market sentiment stabilizes and returns to normal, and previously suppressed consumer, investment and other forms of demand will be released, leading to an economic rebou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s economy will not be changed due to an pandemic.

During the pandemic, consumptions resulting from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re

⁴⁷ Bingfeng Ba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da str. 99, Shanghai, P. R. China, E-mail: baibingfeng003@163.com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lost and irreversible, such as New Year KTV consumption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however, online consumptions are less affected, such as online shopping (which shall test the 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to resume work expeditiously after the pandemic), and the stock market. China's development trend will not change, but the pace will be slower than before.

Whilst the pandemic has impacted upon the economy, it may have also provid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even spawned new formats. For example, the “home-economy” including telecommuting, telemedicine, online education, e-commerce, unmanned distribution, and online games, has become a new economic growth spot in the pandemic.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dur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pandemic, the use of big data and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nalyze potentially infected people and predict the trend of the pandemic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 joint study by KPMG and the Alibaba Institute shows that China's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amongst the highest and strongest in the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economy is bound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longer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virus makes it difficult to schedule work resumption. The main areas affected by the SARS pandemic in 2003 were concentrated in Beijing, Guangdong and other places with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on th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owever, Hubei Province, which has been the epicenter of this pandemic, is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onnected to nine provinces, and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and industrial base in China. The chemical industries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re the pillar industries. Other regions that have been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include Henan, Guangdong, and Zhejiang, which are also important manufacturing, port hubs, and labour-exporting provinces in China. Due to factors such as delayed resumption of work, control of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restricted traffic, the concentration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of people returning to and resuming work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this year has bee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the Baidu Migration Index, it can be seen that, unlike previous mass return trips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this year's population flow has decreased to only about 1/4 - 1/5 of the levels from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lthough restricting the flow of people reduces the risk of a second wave in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it most certainly also impact upon the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 supplies, the backlog of inventory, and the heavy operating cost burdens have also added to the difficulties on enterprises to fully resume production, and have also affected enterprise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In addition,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s led many industries in China to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having important roles to play in it. The recovery of China's production capacity will surely also impact upo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ore detailed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higher the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of synergy, which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l. However, once a problem occurs, it is relatively complicated to restore the entire network and it takes longer.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developed a unique supply chain model globally. From screws, metal structures, to chip processing, hundreds of suppliers are linked together, forming a net like Lego bricks.

The more detail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higher the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of synergy, a benefit seen in the Pearl River model. However, once a problem occurs, restoring the entire network is relatively complicated and more time consuming.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developed a unique global supply chain model. From screws, metal structures, to chip processing, hundreds of suppliers are linked together, fitting together like Lego bricks.

More than 60% of China's electronic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re in the Pearl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River Delta region, and most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s require more than 80% of employees to be in place to operate smoothly. In order to encourage new and old employees to return to the production line as soon as possible, Foxconn Longhua Park introduced a relatively attra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 on bonuses for employee on-boarding.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most manufacturer enterprises divert and concentrate existing personnel to maintain production lines that have conditions to operate. Compared with the pandemic, the impact on supply chain from the economic downtur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 is the most profound.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of multiple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it can be seen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giants would mitigate risks in the past by looking for two suppliers in the same country. The current trend though, is to have separate suppliers in two countries. The advantage of setting up supply chains in both places is that once the domestic market is affected, production capacity can be quickly transferred overseas, or vice versa. There must be not only product hedging, market hedging, customer hedging, but even business model hedging to offset negative impacts.

The supply chain enters a recovery period

The dynamic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ts heavily upon everybody's hearts all the time. There has been some positive momentum shown recently in this pandemic, the supply chain is beginning to enter into a recovery phase. Various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he resumption of work, especially in the supply chain department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ich are getting busier and busier, and the attention of everybody is focused on these.

Urging suppliers to expeditiously resume the supply of materials, resolve issues of staff shortages and accelerate recruitment, coordinate logistics resources to resume shipping, resume production supply, and deliver and fulfill as soon as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possible, previously owed orders.

If the state of supply chain stagn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is compared to the crisis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are now fully ente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Now that dawn has begun, and supply will gradually recover, are many people in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ecting that the supply chain will soon pass through difficulties? Do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e trend of supply and demand should be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except for masks, medical and other special hot industries),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capacity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ach a balance, and the supply chain returns to normal? I'm afraid it's not that simple.

Comparing the state of supply chain stagnation to the crisis period early in the pandemic, it can be fel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are now fully engaged in the recovery phase. Now that dawn is upon us and supply is gradually recovering, do many people in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xpect that th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the supply chain will soon be overcome? Do many people really think that the trend in supply and demand should be shown (except for the mask production, medical and other special 'hot' industries)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capacity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then that supply and demand would reach an equilibrium, and the supply chains return to normal? I am afraid it is not that simple

Will demand be V-shaped growth?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country is continuously promulgating various favorable policies to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Many economists have stated that they are still optimistic about the economy in 2020. On February 20th, the IMF president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recover rapidly.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a "V-shaped" growth, that is, a rapid rise in economic activity after a decline. The overall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China's economy is relatively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controllable. More economists gave specific figure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the GDP growth rate is expected to decline to 4%, after which it will recover quickly. The full-year GDP will still reach 5.8% (only slightly lower than 6.1% in 2019).

So if GDP is a deep “V”, is the supply chain of each enterprise also going to be a deep “V”, and that after the full resump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the supply chain will return to normal? I am afraid it is not that simple. For the industry, the rebound is not a deep V, but it is likely going to be a fluctuating process.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The fluctuation of a single industry is often greater than the fluctuat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y, and for individual enterprises, it will experience even higher fluctuations. If we add the impact of the bullwhip effect to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industry, the amplitude of volatility may be even more pronounced.

Oversupply may occur during recovery

Oversupply may occur du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Not surprisingly, som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ll soon face oversupply.

Why is this so? We cannot ignore the potential risks on the demand side. For example: a large amount of physical retail is still stagnant at the end of January, causing sales to stagn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atus in pandemic control still cannot be relaxed, and the pace of consumption recovery remains to be seen. Inventory of some traditional channels is already at a high level, especially for product enterprises that focus on sales through offline channels. Although it was seen that orders from B2B custom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the first few weeks of February, this may only be a contingency measure of customers facing supply risks, and that real demand has not increased. Demand will decline significantly after supply is restored. Insufficient demand at the consumer end will be transmitted upstream in the industry, and upstream enterprises will gradually feel it. For some pandemic related products (such as thermometers), the demand may gradually cool down in the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future after high demand was experienced in the early stages. The pandemic has also changed the structure and preferences of consumer demand. Product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hygiene and telecommuting have become hot sale, whilst others have been left out for the same category.

Consequently, the current supply chain cannot just focus on restoring supply, but also need to conduct formal and proper research on the customers and demand side! Another accident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will lead to the trouble of inventory backlog needing to be faced; demand rebounds, and the supply chain will again face a big test.

Demand rebounds, and supply chain faces big test

If the outbreak is under control, the second quarter may, as many economists foresee, see a rebound in consumption and in the economy. Everyone believes that demand will rebound, but when it does happen, how high the rebound is, is not easy to say; and there may be no small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f a company fails to gauge the precise timing and quantity in time, or does not reserve the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advance, the result will be that the company misses out on great market opportunities. However, if a company proceeds at the wrong pace and comes in a little too late, it will turn into a pan-chaser and cause a large inventory backlog.

In short, many facts in history prove that after a special event, th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will experience a period of rebound shocks (SARS in 2003,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earthquake in Japan in 2011 ...), and the bullwhip effect will be reflected again, which should cause every Sufficient attention of each enterprise. If the supply chain steps the wrong pace, it may cause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not only missing market sales opportunities, but also a large inventory backlog. In terms of warehousing, the minimum inventory is met, and the subsequent purchase amount i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order situation, which can buffer the impact of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the reboun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 summary, facts from history have shown that after special events, th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will experience a period of rebound shocks (SARS in 2003,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earthquake in Japan in 2011 ...), and the bullwhip effect will be reflected again, which should be sufficiently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each and every enterprise. If the supply chain steps at the wrong pace, it may cause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not only missing out on market sales opportunities, but also a large inventory backlog. In terms of warehousing, the subsequent purchase amount of enterprises should be evaluated to meet the minimum inventory, which can buffer th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the reboun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spiration and suggestions

The road to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is not smooth, and enterprises will still face many potent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from both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How should the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face these?

It is suggested that work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se area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news developments, grasping the general trend, industry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rends, and timely grasp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trends and market conditions; improving risk assessments, and implementing emergency plans and work; and improv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chanism to make predictions on future supply and demand and adopting active response strategies simultaneously.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 ought to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end-to-end collaboration with suppliers and channels and customers to jointly face challenges.

1. Strengthen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t all levels should implement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local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actual conditions. While government makes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at critical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need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utilities,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s lives can resume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These critical enterprises must 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 other enterprises to complete preparations for resuming, and to resume production in an orderly manner after the pandemic control standards have been met.

2.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resume work and resume production.

Guide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re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lans and emergency plans,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measure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sure tha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are in place, quarantine inspections are in place, facilities and materials are in place, internal management is in place, an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re in place to ensure a stable production and life sequence.

3. Strengthen the guarantee of the factors of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help enterprises coordinate and solve problems such as employee return, raw material supply,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terial protection such as masks, killing supplies, and temperature meters, and guid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production self-help. Promote the relevant units to implement phased deferred payment of electricity, water and gas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and implement the "non-stop payment of arrears" measure during the deferred period. We will increase the guarantee for resumption of employment of enterprises, accurately survey and release information on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of enterprises, promote online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and remote recruitment, strengthen local supply and demand integration, tap local supply potential, and meet the company's periodic employment needs.

4.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MEs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ervice pandemics.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key protection enterprise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all cooperate with relevant protection work.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at have the

后疫情时期的治理与复苏

conditions and are willing to switch to production of pan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one enterprise, one strategy” must be provided, and al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help coordinat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witching.

To sum up, all these point to the 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to have both lean and efficient operations, as well as agile and flexible capabilities -- also known as lean supply chains. It is not enough to build a smart supply chain on a temporary basis.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of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However, this pandemic has indeed brought about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any's supply chain. It is worthy of a company's strategic attention and long-term efforts.

The supply chain in 2020 is doomed to be extraordinary. I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ring you inspiration and reminders. I wish you the best in your efforts to grasp 2020 and turn the crisis int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your company and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